

权力分赃：西方政府起源的隐秘真相

陈童

—1215年，英格兰的一群贵族将国王约翰围在泰晤士河畔的草地上，强迫他签署《大宪章》。这不是自由战胜专制的史诗，而是一场关于如何分赃国家权力的赤裸裸谈判。—

西方政治史教科书将政府起源描绘成社会契约的产物，讲述着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动人故事。然而，当我们剥去意识形态的华丽外衣，看到的是一幅更为真实的图景：西方政府起源于贵族间的权力分赃。这种分赃逻辑，与起源于抗灾需求的中国政府形成鲜明对比，造就了二者根本性的文化基因差异。

01 契约神话背后的权力分赃

西方政治思想喜欢将政府起源包装成“社会契约”的产物，仿佛民众自愿让渡权利形成公权力。这一叙事巧妙掩盖了真实的历史过程。现代西方政府的直接前身是封建采邑制。在中世纪欧洲，国王不过是最大的地主，其权力建立在与各级贵族复杂的封建契约关系上。国王提供保护，贵族提供兵役和赋税——这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与利益的交换协议。英国《大宪章》的签署常被奉为宪政民主的里程碑，但其本质是贵族阶层对王权的集体勒索。当国王约翰在对外战争中失利并试图增加税收时，贵族们联合起来，迫使国王承认他们的“古代自由与特权”。这些“自由”并非指向平民百姓，而是贵族征税、司法、狩猎的特权。《大宪章》是一部典型的分赃协议，它确立了贵族阶层在国家权力中的固定份额。欧洲各国的议会制度，如英国议会、法国三级会议，最初都是贵族与国王就权力和资源分配进行讨价还价的场所。这些机构并非民主的摇篮，而是统治阶层内部利益博弈的平台。

02 战争驱动的国家建构

查尔斯·蒂利直言：“战争制造国家，国家发动战争。”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，本质上是一部军事财政机器的构建史。为应对连绵不断的战争，欧洲君主需要大量资金，而筹集资金需要建立税收系统，维持税收系统又需要建立官僚机构。这一循环催生了现代西方政府的基本框架。在这

一过程中，国家权力成为君主与贵族之间交易的商品。君主给予贵族地方统治特权，贵族为君主提供战争资源。荷兰学者范赞登指出，欧洲早期国家的制度建设“主要是为战争筹资的副产品”。这种以战争和交易为驱动力的国家建构，与古代中国为应对大规模水患而建立的政府形态形成鲜明对比。一个为分割利益，一个为集体生存——二者的原始基因已然不同。

03 从贵族分赃到资产阶级分赃

随着资产阶级的崛起，西方政府的分赃本质并未改变，只是参与者发生了变化。资产阶级凭借其经济实力，逐步挤进了权力的分赃圈。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表面上是扩大选举权，实则是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重新划分政治势力范围。改革后的议会不再是贵族俱乐部的专利，工厂主、银行家、商人获得了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话语权。美国建国过程更是权力分赃的典型例证。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，大州与小州、北方与南方、商业利益与种植园利益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价。美国宪法本质上是一部分赃协议，它确立了各利益集团在联邦权力结构中的份额：参议院照顾小州利益，众议院按人口分配，选举人团制度则是奴隶制与民主的怪异妥协。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“三权分立”，最初设计目的并非为了保障人民权利，而是为了防止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垄断全部国家权力。麦迪逊在《联邦党人文集》中明确表示，制衡机制是为了使“野心对抗野心”。

04 不信任政府的文化基因

起源于权力分赃的西方政府，自然孕育了不信任政府的文化基因。如果政府只是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结果，那么普通人有何理由对其抱有真诚信任？西方政治文化中对政府的深刻怀疑，正源于其“权力分赃”的出身。当普通人看清政府不过是利益集团瓜分权力的舞台，冷漠与疏离便成为必然。这种不信任已深植于西方文化的骨髓中。从“政府不可信，必须被关在笼子里”的流行话语，到无处不在的阴谋论，都反映了民众对权力本质的直觉认识。相比之下，起源于抗灾需求的中国政府，其合法性建立在实际绩效基础上。大禹治水的传说象征着一种不同的政府逻辑：政府的存在是为了解决民众的生存需求，而非精英阶层的利益分配。

05 分赃逻辑的当代演变

当代西方政府虽经民主化改造，但其分赃本质并未根本改变，只是形式更加精致化和隐蔽化。政治献金、游说集团、旋转门现象——这些现代

民主的标配，不过是传统权力分赃的现代化身。在“民主”的外衣下，利益集团依然通过合法渠道瓜分着国家权力和资源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指出，美国政治体系已沦为“1%所有、1%所治、1%所享”的体制。西方民主的理想与其现实之间的鸿沟，正源于其权力分赃的原始基因。这种分赃逻辑也解释了西方政府为何在应对气候变化、疫情防控等全民性危机时常常力不从心。当政府被视为利益博弈场而非公共利益的代表时，集体行动的能力必然大打折扣。西方政府起源于贵族分赃，这一历史基因决定了其对内代表部分利益而非全民福祉，对外追求排他性优势而非共同生存。理解了这一点，就能明白为何中西政府对自然灾害、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思路如此不同。分赃者关注如何瓜分蛋糕，抗灾者关注如何让所有人活下去——这种起源差异塑造了二者根本不同的行为逻辑。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、疫情蔓延等全球性生存威胁，或许中国政府“抗灾”而非“分赃”的原始基因，能为人类治理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。在生存危机面前，分赃的逻辑显得如此短视而渺小。